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从故国到新朝：龙眠诗学生态的形成及其谱系传衍

童岳敏

摘要：明清易代之际，江南诗学的版图呈云、龙并峙格局。就桐邑诗学生态而言，其既有遗民色彩的典型化呈现，也涵容着传统的地域诗学特质。这种混层化诗学共同体的形成体现了地缘、血缘及学缘的关联，在故国与新朝的诗学语境中形成了同声共气的聚合，也展现出重师法、尚实学、崇阅历的创作特性，诉诸诗史之演进，则呈阶段性与多维化的形态。而在诗学谱系的建构上，对陶、杜、白的形塑不仅是传统语言、结构等诗学规范的衍化，更是龙眠诸子生命诗学的具体化。

关键词：故国；新朝；龙眠诗学；谱系建构

作为历史叙述的一种概念性指称，“故国”与“新朝”的对举不仅是时间链上易代之际阶段性的呈现，就“新”“旧”对立所指涉的文化内涵而言，也包含着政治态度、价值立场及情感状态等关联的内容；诉诸诗学领域，既表现为传统诗学形态的传衍，也意味着时代性的因素对固有诗学观念及经典文本的具体化及其解构。从地域诗学横向比较的视野来看，明末清初江南的诗学面貌呈云、龙并峙的格局。而论之主体形态与文化表征，桐邑诗学集群的文学态势表现为遗民性质的创作与大众化写作的混层互动，其出场状态、经验形成及经典化谱系的建构都具有独特之处。因此，对鼎革之际龙眠文学场景的还原追溯，可以为进一步探究明清诗学发展嬗变的内在动因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一、体派认同：云、龙并峙的江南诗学格局及其地缘因素

明清易代，江南的诗学形态展现出一些新的品格，在时空维度上呈现出不同层次的拓展，此时的诗学观念逐渐摆脱格调、竟陵诗学旨趣之争，更强调诗史视野下诗教的复兴与崇真尚气创作理念的提倡，而王纲解纽的政治变迁及朝、野离立的文化机制也进一步促使江南诗学板块的地域空间与历史情境变得更为复杂。若考虑到地理沿革与当时的行政区域划分，明清之际的江南应指苏、皖、浙及松江一带。以长江为基线，三吴及华亭属于下江，以太湖流域“五府一州”为中心建构人文学术谱系。而皖南宣、池、安、桐等地（皖江区域）则称为上江，以桐、宣两

地为文坛渊薮。^①但就江南诗学格局及其演进而言,学界多以云间、虞山及娄东三派先后鼎立赓续来阐述诗史之进程,对桐、宣两地的诗学生态及其与下江诗学的互动衍生缺乏深入的梳理。^②

清初,桐、宣两地实为上江人文蕴盛之区,施闰章曾言:“余闻之父老,江上人物盖称二城,谓桐城、宣城也。”^③另秦陇诗人韩诗久客江南,与宣城梅氏及桐城方氏多有诗文唱和,论及江南诗学也推崇上江,如其序田茂遇《水西近咏》云:“以予所闻,海内崇尚诗学有三派,曰宣城,曰华亭,曰桐城。”^④明季宛陵文坛风云雷动,沈寿民、万应隆与贵池吴应箕、芜湖沈士柱等倡名皖南,又与吴门复社会于虎丘,选文核实,激扬声气。另宣城梅氏家族中的梅朗中、梅庚、梅磊及唐允甲、吴肃公等皆以诗著称。至清初,施闰章与高咏等多分题唱和,号“宣城体”。而华亭与桐城两地则虎踞龙盘,为艺林渊薮,呈云、龙并峙之势。毛奇龄《龙眠风雅序》云:“予思江左言诗,首推云间。而云间又首推陈氏。当夫黄门崛起,与海内争雄,一洒启、禎之末狙狯余习,而其时齐驱而偶驰者,龙眠也。故‘云’‘龙’之名,彼此并峙。”^⑤另王西亭《陈涤岑先生六十寿序》云:“胜国时,吾郡(云间)与龙眠,文章巨公后先辈出,操执文柄,流风所披,天下景从。冠裳玉帛之会,不南走松,即北走皖,耆硕少俊登诸公之门者,一蒙奖识,闻望顿起。诸公勤恳推毂惟恐后,四方之收名定价于云间、龙眠者,与西江、娄水前后相埒,亦极一时之盛已。”^⑥云间、龙眠诸子诗文酬唱,意气相投,兼有鼎足抗衡之意。“天下诗赋之业,江南之有云间,犹江北之有桐城,而其才用精实,足当风尘,则非云间之可望也。”^⑦崇祯五年(1632),方以智遇卧子于西湖,诗文迭唱,相交甚欢。崇祯九年(1636),宋征舆初识方以智、周岐和孙临于南京,以风雅见知。崇祯十一年(1638),陈焯游三吴时与华亭李雯、宋征舆有“云龙”之选。崇祯十五年(1642),李雯主虎丘大会,云间与龙眠诸家也皆荟萃于姑苏,互相赠答剡切。李雯《答方密之书》曾云:“弟欲以卧子当密之,辕文当克咸,弟当农父,使其旗鼓相当,似皆不肯避舍。”^⑧崇祯十七年(1644)秋,陈焯携方直之游华亭。“衡文吴下,张扬愿撤皋比;正雅云间,陈李齐投缟带。”^⑨宋

征舆云:“二三子之上公车者,隼已留,不隼则也亦未返。与二子抗衡者,徐惠朗、邵景说、张处中及不佞兄弟耳。彼以锐师来而我郡以偏师应,其不奔北者,幸也。维是十年之间,岁月如电,桐山、云间之交日以益深。”^⑩可见,龙眠诗学之盛不亚于云间,李雯《执宜集序》更有“余郡多文人,而所弗若于桐者三,有师法一也,尚实学二也,崇阅历三也”^⑪之说。

- ① 长江水域“江分上下”,古已有之,汉魏以来,“上江”“下江”所指的区域范围整体东移。明代出于漕运、江防、监察、学政的需要,南直隶已大致以应天府为界,分成“上江”和“下江”两部分。如《明世宗实录》卷四十四:“裁北直隶总并入山东,分南直隶为上、下江,使上江总兑安庆、池、太、广德等处,不复东过瓜洲;下江总兑苏、松、常、镇等处,不复西过仪真。”吕柟《陈思古集序》曰:“宸濠之变,(陈思古)领兵驻下江,节制镇、常、苏、松、仪真军。”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二十九《川渚六》曰:“上江,即江宁以西滨江诸郡。”清初江南省的巡抚、按察使司、布政使司、学政辖区,以“上江”“下江”为基础进行调整,最终形成安徽、江苏省域。关于“上下江”的疆域范围及其政区地理的意义,可参阅何建华:《“上下江”与江南分省新探》,《史林》2022年第5期。
- ② 如彭志《明清之际地域诗歌研究的态势视角——以江南地区为观照对象》(《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周明初《明清易代与江南文学版图之重构》(《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诸文更侧重于狭义范围内江南诗学的传承及其研究。
- ③ [清]施闰章:《龙眠风雅序》,《施愚山先生文集》卷三,清乾隆刻本。
- ④ [清]田茂遇:《水西近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7辑第23册,第31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⑤ [清]毛奇龄:《西河集》卷三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292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 ⑥ [清]王原:《西亭文钞》,《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71册,第39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⑦ [清]李雯:《与孙克咸》,《蓼斋集》,《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11册,第94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⑧ [清]李雯:《蓼斋集》,《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11册,第50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⑨ 李岳瑞:《王文靖遗文》,《春冰室野乘》卷下,《关中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排印本。
- ⑩ [清]宋征舆:《林屋文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15册,第27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 ⑪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六册,第277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6。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明清之际的士人多重师门,讲源流。如陈子龙著《师说》,黄宗羲有《广师说》,另徐枋也著有《师说》。从宗法传统与伦理秩序层面上看,重视师门家法,有着重建儒家文化体系中政统、道统的诉求,而就诗学指向而言,“有师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诗学传统的延续和经典化的建构。考察诗史之接受源流,龙眠一脉瓣香七子,但对格调诗学的理论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如方以智论诗神、气、声并重,讲究格、调兼备,但也有主盛世变诗说。周岐《流寓草叙》倡言诗道之正在“审音律、辨雅俗、核词气”的同时,推崇三闾大夫、太史公及杜甫之发奋激烈与悲壮沉郁。^①这在诗学观念上体现为对格调论价值系统的突围,而对陶、杜、白等人的推崇则反映出龙眠诗人对诗史经典秩序的拓展与重构。此外,这种“师法”意识也往往通过郡邑诗选、诗话及批评彰显出对“地域诗学共同体”的遵从与体认。如《龙眠诗传》《龙眠风雅》及后来《枞阳诗选》等总集的汇纂选裁展现了桐邑诗歌传播流衍及其经典化的生成。而《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钞》《述本堂诗集》及各种家传则以累代辑纂的形式建构出地方诗学谱系中家族链的传承网络。同时,各种文会诗社、节俗花期及里中唱和都展现了区域诗学的群体特征及其诗学生产的凝聚力。这些无不表征着桐邑师法的渊源及其创作之繁复。

基于社会政治变迁所带来的文化反思,明清之际的学术对王学末流谈玄课虚空疏之流弊进行了批判,表现出强烈的实证学风与经世达用的精神追求。这种“尚实学,崇阅历”的学术品格成了时代风气,在桐邑士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将桐城之学溯及易代的方以智、钱澄之及戴名世,认为“密之、饮光皆间关忧患,从永历到滇南,气节凛然,为后世进式”^②。明季桐邑多兵燹之灾,崇祯七年(1634),贼寇汪实甫、黄尔成作乱于桐城北郊;崇祯八年(1635)至十五年(1642),张献忠部及土寇曾多次围城侵掠。顺治初,清军南下,英山、霍山及桐城义军结寨抗争,龙眠诸子不仅在桐城枕戈泣血,还矢志隐潜史可法幕府、弘光 and 永历及隆武政权,在铁血社稷的现实体验中强化了学术思想的经世倾向与反思意

识。体现在史学层面上,方以智《史统序》《史论》《考古通论》诸文崇实黜虚,强调求事求理的史学思想。而戴名世《左氏辩》《子遗录》《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钱澄之《所知录》及朱书《皖寨纪事》等严持华夷之辨,力主存疑正讹的史学批评。在诉诸道德实践与实体哲学方面,龙眠诸子则强调格物下学之功夫,将性情天理之追求与问学实践结合起来,如方氏家族合编的《周易时论》、钱澄之《田间易学》及吴应宾《宗一圣论》等多义理、象数兼具,将天道、心性纳入“时世论”的范畴。而在创作领域,“尚实学”的精神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对传统雅正旨趣的尊崇。“尚实学,则含英咀华,先求根柢,风、雅、乐府户习家传,虽闺阁童孺之言必无粗俚寒俭之态。不竞浮名,则适性缘情,各摅才致,外诱莫夺,世趋莫移。故有明三百年来诗体三变,龙眠之名卿硕士与四方分坛立墀者,未尝不声光相接而坚守朴学,一以正始为归者,固自如也。”^③在动荡的年代,“实学”与“阅历”丰富了桐邑文士群体的抗争经验,在诗文创作时则多转化为易代之悲及心灵历程的抒写。

此外,从诗歌发生学的属地因素来考量,龙眠诗学场域多聚焦于龙眠山的文化空间。作为地方景观与诗学活动空间,龙眠山深度参与了桐城士人隐居、耕读、结社以及游览唱和等日常生活范畴,成为其确立身份意识、建构地方文化认同的场域。^④同样,龙眠诗学生态的多维性也是基于此地的各种文化实践,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方学渐于龙眠河畔筑桐川会馆,与赵鸿锡、童自澄合称“桐川三老”,讲“体善”“良知”之学。另胡瓚宗等也曾建桐溪书院,龙眠之学渐盛,高攀龙许其与东林比肩。一些簪缨之家及文人隐士也筑室龙眠,万历四十一

① [清]周岐:《流寓草叙》, [清]方以智:《流寓草》卷首,明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

②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期。

③ [清]陈焯:《龙眠风雅序》,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一册,第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3。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④ 何建华:《景观与地方认同的建构——以桐城龙眠山为例》,《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4期。

年(1613),左光斗建三都馆于龙门,后增建的有左氏读书处、越巢、抱蜀堂等。此外,河墅、环翠山房、写园、长松别业及黄柏山房皆为龙眠诸子耕读唱和之所,而龙眠的碾玉峡、别峰庵、媚笔泉及大龙井等自然景观也成了诗文创作中反复咏叹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龙眠”成了桐城文士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钱澄之就自号“龙眠酒徒湖海士”,另方以智自称“龙眠愚者”,家族诗人群体中也以“龙眠”自矜其地缘属性,如左氏一族有“龙眠三左”“龙眠四杰”之誉,戴宏烈与戴研合称“龙眠大小戴”。此外,尚有“龙眠五子”“龙眠十子”之说。故揆之诗学发生时“人地关系”的阐释视角,正是“江山之助”的典型化与事件性的呈现,才建构起了龙眠的诗学空间与谱系传衍,进而影响到后来桐城诗派的兴起。

一般而言,明清以降地方诗学群体的形成,多基于区域文化传统的建构和以家族链为基质的师生、姻亲及同门等社会网络的维系。桐邑诗学的兴盛,也体现出这种地缘与学缘的关联。从江南诗史演进的过程来看,龙眠诗学在时代的诗学语境中形成同声共气的聚合,于云、龙并峙的格局中展现出“有师法、尚实学、崇阅历”的创作特性,也通过由龙眠至桐邑的文化空间彰显其诗学体系的独立性与创作风尚趋同性的一面。然而,鉴于士人秉性天赋、审美旨趣、身份意识及阶层属性的差异,主体创作的心态和文学经验的表述呈多样化的态势;受时代诸因素的影响,桐邑诗史的演进也有阶段化趋势。正是因为这些主客观因素的多元互动,龙眠诗学生态才呈现出多维化的景观。

二、诗史进程： 阶段性及其诗学生态的多维化

有明一代,龙眠诗学兴盛,吴道新将其比附三唐之盛,“以洪、永、宣、成四朝为初,弘、正、嘉、隆、万历为中,启、禛为晚”^①。那么,龙眠诗学始于何时?一些史志将其溯及宋代“龙眠三李”^②,其实,对于明季桐邑诗坛来说,李公麟的龙眠山居及其与苏、黄等人的交游唱和更具有象征性的典范意义,是桐邑诗学记忆中发源地

及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本。至明初方法、钱如京及余珊诸子,可谓初始。但真正诗学之发轫应降及明代中叶。万历以后,龙眠诗学乃谓昌盛,邓森广《论龙眠诸子诗》云:“吾党尚风雅,龙眠诸子始。岂不怀古英?既贵洛阳纸。前有赵中丞(赵公鉞),既乃齐太史(齐公之鸾)。兵部(吴公檄)盛威仪,容台(戴公耆显)扈芳芷……中闺扇雅风,须眉所深耻。予也敦素惊,谁誉亦谁毁?努力振元声,自笑辽东豕。”^③诗中所描述的诗人群体,著名的诗人就达四十余人,涉及方氏、吴氏、陈氏及汪氏等家族,此诗不仅概述了诸子创作风尚与审美旨趣,在一定程度上也勾勒出明中叶以来桐邑诗史发展脉络。如正嘉以迄万历,赵鉞、齐之鸾、吴檄、戴耆显、方大任、叶灿、吴应宾及阮自华等风雅相继,导夫前路。此后,赵相如、江中龙等并驱屈贾、齐名李杜,吴道凝绍古歌,吴德操擅歌行,方壶精近体,潘江、方文等好苦吟、慎推敲,诸子角逐诗坛,各领风骚,而方孟式、方维仪及吴坤元等人的闺门雅囑,同样不让须眉。龙眠诗学之盛,不仅艺文繁复,与主流诗坛也形成桴鼓相应之势。晚明诗坛复古与性情并起,诗学取向多元。龙眠文士与七子、公安等皆有交集:“当嘉靖初年,八才子继李、何之后狎主齐盟,其同游海甸一诗,独尊吴皖山为绝唱。万历间,公安袁氏兄弟调鞅词苑,而不能不以大雅尊吴客卿。”^④故龙眠诗学取向与时代潮流多有应和,若就其特色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古诗必汉魏、三谢,近体推尊唐人气韵,讲究格调声色。何存斋曾言:“邑中先哲论诗者,多如《雾灵集》《霞起楼集》《寒知阁集》《青莎馆集》《种槐轩集》《江蓠草集》《秋水斋集》《咏怀堂集》《鸛鹄庵集》《简轩人九集》《方素亭集》《吴兵部集》《刘廷评集》《方

① [清]吴道新:《龙眠风雅序》,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一册,第3页。

② 汪长林校点:《(道光)桐城续修县志》卷十六《人物志·文苑》,第604页,合肥:黄山书社,2019。

③ [清]邓森广:《论龙眠诸子诗》,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三册,第1323-1324页。

④ [清]陈焯:《龙眠风雅序》,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一册,第7页。

南淙集》《马秋庄集》《方鑫山集》，皆擅四唐之胜，各极一时之长。”^①其中齐之鸾“歌行追少陵，近体直逼初、盛，洵词坛巨匠也，朱之蕃称其遒劲”^②。阮自华父阮鶚，推崇汉魏盛唐，守庆阳时，构堂祀李崕峒，作《怀贤堂赋》以寓意，自华古体诗生气蓬勃，挥斥自如，深得汉魏人遗意，较之茶陵、历下诸公仿古，殆为过之。^③齐莱名《青莎馆集》诸诗以今人之情衍古人之法，清不伤致，艳不伤色。许来惠序诗云：“其声调高以壮，宏以富，敲金戛石，灿然若文锦，而其玄言微致，引人入胜，文不掩其质，质不没其文，合王、孟、岑、杜为一家，视古人之作者，何多让焉。”^④此外吴檄、阮大铖、方学渐创作皆承唐人遗韵，为格调本色。

其次，正嘉以降，心学兴盛，桐邑诗坛受此影响，诗风也流呈出求真情、尚自然及性灵情趣的取向。如盛汝谦，其学阐良知，深于性命之旨，《赠武湖山年丈顿山别业》惬意自然，得渊明田园之趣。赵钺为“嘉靖四杰”之一，筑室龙眠宜秘洞，以文章名时，与罗汝芳、王慎中交，学者宗之，黄宗羲《明文授读·大兴寺记后》云：“鼎卿诗文无蹊径，匠心而作，固是能者。”^⑤《龙眠山次韵苏颖滨韵二十章》《助山堂杂咏》清逸俊爽，颇有辋川遗风。钺子赵鸿赐好读书汲古，师事耿天台、张甌山两先生，与焦漪园、管东溟称高足，又游于罗德先之门，衍新建良知之旨，著《人海鸥吟》，诗风清新真诚、简洁灵动，体现出回归自然的审美旨趣。又钱可久在隆庆间与吴中王百谷、周公瑕齐名，方学渐《迩训》卷十七《任达》称：“倜傥清妙，交一时名流，玄纁千金不顾也。诗才俊爽，字画遒润。自言与西湖结物外交，当驾轻舟千里，访之叩舷高歌，旁若无人，泛楚江，下金陵，访西湖，流连吟啸，时谓风流。”^⑥万历以后，诗坛公安末流有肤浅轻佻之弊，竟陵则力主深厚，诗风幽僻有逸气，桐城诗苑也有应和。如张秉文与钟退谷、陆景邨诸人相唱和，诗歌幽沉清远。《杂感》“春波晓涨添鱼子，微雨宵零长竹孙”^⑦，摹写物候，极具天趣，《秋夜对月》《访客黄山中》幽深中自有简远峭逸之气。又姚孙森不袭王、李肤调，多以性情为主，其诗初学竟陵，体喜刻露，久乃渐臻高老。总体来看，明代中叶诗学思想与创作面貌多

元并存，桐邑诗坛既承衍汉魏三唐之本色，展现出复古格调的潮流，也受到吴中、公安及竟陵的影响，诗学旨趣以自然求真为本，体现了心学流播下龙眠士人心态的变迁。

启祯以还，直至清初，桐城先有兵燹之灾，又遇国变之厄。时局动荡，政治形势遽变，诗学形态也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以甲申易代为界，前后期诗歌的主题取向及其审美旨趣有所不同。崇祯中后期，桐城战乱不休，田庐荒废，尸骸遍布原野。“入其邑，室颓垣倾，污秽崇积，人不满千，皆扶病颠连。”^⑧遭此厄运，桐邑死伤惨重，如崇祯十五年（1642）春，桐城兵贼交江，大姓皆尽室南渡。齐程每每登陴东望，痛哭失声，作《望南畿诸台官》诗十首，音节悲壮，得风人讽谕之旨。此外，诗人汪国土、方若坤及夏统春也皆死于战乱。另据徐璈记载，御贼身殉的文士还有阮之钺、左光灿、左旗、吴晋昭、姚孙极、王夷吾、赵之葵、陈力及笪光宏等。^⑨受战乱的影响，“沦陷地”的诗歌创作，多以诗为史，实录兵火灾祸，揭示其罪恶。如张秉彝《读春陵行有感作苦桐吟》云：“甲戌乱民起，乙亥贼骑横。杀人如刈草，百里不闻声……连绵十五载，无岁不称兵。少壮离乡国，老弱填沟塍。青磷遍原野，白骨积嶙峋。死者既不甦，生者更惛惛。”^⑩全诗描述了桐邑苦难的现实，诗句真朴之至，纯系白描口语，诗情沉郁，一片怨怒声闻。方若洙晚年因寇逼危城，婴城固守，著《军城歌》一卷，论者有“诗史”之目。王彭年于崇祯丁丑（1637）遭寇死

①③⑤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四册，第82、82、180页。

②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一册，第73页。

④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三册，第100页。

⑥ [明]方学渐：《迩训》，北京图书馆藏明刻本。

⑦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五册，第7页。

⑧ [清]王雯耀：《全桐纪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1册，第38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⑨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八册，第1页。

⑩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三册，第1025页。

节,有《悼亡诗》百首,悲惋凄楚,闻者泣下,《读史》《寇》《兵》诸诗也充分寄寓愤慨之情与批判精神。此外,光时亨《泣黄湓》《扬兵却敌》、王夷吾《贼退后潘九茎过访赋赠》、李在松《寇纪》、周岐《贼军围城思老母》、彭大年《寇焚书堂》《贼至杨家岭》、吴德坚《终天恨》等,或行吟山野,访死问生,或惊离吊往,哀唱苦吟,皆桐邑血泪之史事。同时,那些矢志守城殉难将士的英勇事迹则被敷成诗什,在桐邑广为流传。如朱寿钱所咏明季领兵战死者有潘可大、张公韬、孙德胜、张士节,守城御贼者有邱山、李沛、程天求、雷明道及黄仙崖,共九人。^①又崇祯十四年(1641),兵备副使张亮至桐亲巡战处,军民士气大振,倪士骐作《张侯莅桐歌》以颂之,窋成战死,程烈《窋将军成》云:“不惜一身死,金城挫贼锋。霎时膏剑戟,万古泣垣墉。血溅城头草,魂归天外峰。君恩曾未沐,临难独从容。”^②是诗凄怆悲郁,意蕴浑厚,充分展现了窋氏英雄气概和忠义之情。另江之汉作《窋公传》诗文以纪之,齐绳祖《谒窋公祠步江向若先生韵》、祝祺《吊窋公》、姚文鳌《吊窋将军成》、吴宗诚《窋公祠次王似山韵》皆是以史笔颂扬死节之士的血泪歌吟。当然,苦难的时代偶尔也有“千寻云洞结楼重,楼下云深积翠封”^③的从容览卷,或“雅招今日客,如在野人家”^④的杯酒小酌,但相对而言,枕戈泣血的悲怆歌吟与风云激荡中心灵历程的抒写,成为桐邑诗坛的创作主潮流。这些哀苦悲壮之篇不但表现了文人遗士的故国情怀,也与《予遗录》《全桐纪略》等地方史志互相发明,真实记载了桐城军民及文士抗贼御辱的史实,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

桐罹寇患,大族巨室多避居金陵,一些诗人与流寓白门的遗老交谊深厚。左国棟栖身白下时,与叔弟子宗、季弟子厚主盟坛坫,有“三左”之称,交游孙豹人、杜于皇、宋牧仲、纪伯紫、阎古古等人,诗歌多有兴亡之哀、悲凉之意。此外,方以智、周岐、钱澄之及方文也与云间诸子在金陵结金石交,多诗文唱和。崇祯十六年(1643),钱澄之、吴德操等编《过江诗略》,相较于早年的大雅为宗、遵守古法的创作取向,此时桐邑遗民诗什更多悲壮的特色。另潘江侨居秣陵时,与戴研、方若珽等为闻鸡堂文会,也多感时吊古之作。

清初国祚渐稳,桐邑政权平稳过渡,清廷蠲免荒田、减少赋税,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一些望族也即入仕新朝。如顺治三年(1646),姚文然经安徽巡抚推荐,选国史院庶吉士;同年,潘映娄授杭州盐法道,改迁福建福宁道按察副使。方拱乾也被荐补宏文院学士,寻除少詹。诸生科考、课子及讲学渐趋正常,多数士人已无炙心灼肤之痛,反抗讽谏意识渐趋锐退,簪绅朝士与逸民野老的创作多回归恬淡自适的隐逸之趣,在清廷雅醇清华诗风的裹挟之下,龙眠一脉中的嗔怒之气与悲慨之风日益平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明季以来遗民诗风走向终结。

整体来看,桐邑诗学的演进历程体现了明季复古的文化思潮,也反映了易代之际国故沦丧之悲;在清初“朝”“野”诗界裂变与融合的趋势中,也同样展现了地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及其审美的变迁。若从创作呈现及其组织形态上予以考察,作为地域化的诗学景观,龙眠诗学随地以系人,因人而成派,形成了带有一定社团流派性质的郡邑诗学群体。受晚明结社风气的影响,龙眠诗坛唱和结社也兴盛一时。如早期林胤沛与豫章王宣及同里方大任、叶灿、方大铉友善,唱和之盛,比于元、白、皮、陆;吴应宾与何如申、何如宠、胡璘、吴用先结为文会。崇祯初,龙眠结社频繁,与江南社团颇有争胜之意,方以智、钱澄之等人结泽社(永社),“养气读书,考事类情,会友丽泽”^⑤,后之云龙社与云间同声相应。崇祯五年(1632),阮大铖网罗六皖名士,以为己羽翼,一以标榜声名,举中江大社。鼎革之际,潘江、许来惠、齐古愚、刘鸿都等先后结闲寻汐社、真率会、射蛟文会、瑟玉堂会、竹林之会。特别是陈式寓居白门时,与何应珏、胡如

①②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七册,第144、86页。

③ [明]周梦复:《读书白云》,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三册,第1214页。

④ [清]盛斯唐:《浴佛后一日为杜苍略诞辰招同林茂之小饮》,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三册,第1215页。

⑤ [清]方以智:《泽园永社十体·泽园永兴社》题下自注, [清]方于穀:《桐城方氏诗辑》卷二十三,清道光六年(1826)伺经堂刻本。

珪、方孝标、姚文烈、姚文勋、方咸亨、姚文然、吴日永、张秉哲及姚文焱等，为潜园十五子之会。“文采风流，照映江左，一时吴越名下士咸相与班荆赠缟。”^①此外，尚有南溪社、金兰社及环中社等。作为地方诗学群体，桐邑诗集文社虽然在价值指向上与时代风潮有一定的关联，如阮大铖组中江大社，颇有与复社争胜之意，云龙社在政治上的表征也较为明显。但多数雅集就其性质而言，更倾向扬榷风雅与交友传名。其中龙眠桐溪的吴氏似古山房、张氏勺园、姚氏亦园及左氏媚笔泉等地成了修禊题咏的重要场所。而寓居金陵时，龙眠诸子更有与江南名士竞名比附之举，如孙中凤随司马公避地金陵，与兄振公、卧公辈延揽四方名士，文坛诗社争树赤帜，一时有“荀龙谢树”之目。顺治初，齐亮与兄中立、升如齐名艺苑；南渡后，与方子诒、子克结射蛟文会，一时名噪白下，里社推为裘领。当然，这种文会诗集的出场状态是基于地缘、血缘及亲缘的诗学关联，也是家族诗学兴盛的表征。桐城望族之盛，明初以姚氏、方氏为始，“中叶以后，遂有吴氏、张氏、马氏、左氏数十族，同盛递兴，勃焉浚发”^②。这些家族也多以诗文著称。据《桐旧集》卷三的统计可知，吴氏家族以诗名世者多达四十余人，并撰有家集《延陵诗钞》，徐璈赞云：“吴氏自退余先生以诗学启其宗，哲嗣则新河吏部，文孙则春麓侍御、星槎刺史、岳青征士，曾重则子方、逖先，一门四世，人人有集，六诗三笔，得得呈材。此家学源流之盛，亦桐山钟毓之美矣。”^③又扶风马氏，马孟祯始有诗名，后嗣有“怡园六子”“四马”之誉。《赖古居诗话》云：“扶风诗推正谊先生为极盛，虎岑先生继之，恒斋先生又继之，才力既富，意境皆深。”^④顾有孝也说：“其家世如王筠所谓人人有集者，宜其诗之盛已。”^⑤此外，方氏、姚氏及张氏也都是诗名卓著的世家大族。可见，从主体构成的层面来看，龙眠诗学的兴盛绵延，是基于家族文化的支撑，如果说婚姻网络的社会根基是其兴盛的沃土，那么学术的传衍则赋予了诗歌创作理性的厚度，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家族诗学的传承、族聚及互动的特质，形成地域诗学共同体的流动与汇聚，推动着郡邑诗学演进与发展的历史进程。而就具体的创作实际而言，家族内外的文会雅集、族

内修学赓和以及家传诗集的编纂等诗学活动，也是桐邑诗学景观的重要构成。

从宏观上审视龙眠诗学的演进，其在时间维度上体现了时代审美旨趣与地域文化的契合，但若进一步考察具体的诗学活动及其生成机制，那么可以看到，一些诗学形态因政治诉求、阶层属性以及社会关系的离合呈现出和而不同的特质。如崇祯时阮大铖名列逆案，举中江社抗衡复社，钱澄之等退出后，阮氏诟怨方孔炤父子。又方其义、陈焯与方文诸子有隙，龙眠诸子间的间隙隔阂，或因性情不和，或因家族之纠纷，形成了不同的交际集群，在诗歌的风格上也各具面貌。清初，桐邑遗民布衣与朝臣新贵在心态及诗风上的离立已属于常态，如清初姚文然兄弟、张英父子及方拱乾父子，仕新朝后，诗风以闲雅自得、雍容蕴藉为主，与布衣遗民悲苦之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诗人创作个性的不同、题材主题的偏嗜以及审美旨趣的差异也会进一步促进龙眠诗学生态多样化的呈现。

三、陶杜并举与崇白风宪： 诗法取向的转变与传衍

清初诗坛有段公案，颇引人瞩目，即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第三十四曾载方文晚年学白乐天，因壬子生，命画师作《四壬子图》，其中陶渊明居中高坐，两侧为杜甫、白居易，方文伛偻于前，作呈其诗卷状。渔阳为之题诗附和，但也揶揄鑫山俚鄙浅俗，戏言在文峻网密的杜甫面前免不了吃藤条。表面上看，这是文士群体间的诙谐戏说，但就诗学心态及创作取径而言，实则离立态势显然。严迪昌先生在清初诗史演进的背景下辨析方、王的诗学旨趣时指出：这不仅是诗坛“簪绅朝士”与“布衣语”的冲突，也是“定

①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八册，第3867页。

② [清]马树华：《序》，《桐城马氏诗钞》，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③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三册，第325页。

④⑤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五册，第431、429页。

于一尊”与“自成一家”之争。^①另有学者也从《四壬子图》的本事源流及文化学的角度剖析其价值。^②其实,从地域诗学的角度来看,方文“陶、杜、白”的诗法取向,不仅是个人诗学观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着桐城诗学内在旨趣与历史逻辑进程。

明人推崇陶渊明,概不离两端,其一为语体古淡,气韵真率自然;其二为避秦不仕宋的隐逸情操及孤愤勃发的风骨之美。如何湛之《陶韦合集序》曾云:“晋处士植节于板荡之秋,游心于名利之外,其诗冲夷清旷,不染尘俗,无为而为,故语皆实际,信《三百篇》之后一人也。”^③另冯复京云:“《读山海经》诸篇,简洁清劲,如冰棱石骨。”^④受明代复古派的影响,桐邑文士也多摹陶,如嘉靖赵鉉筑室龙眠,吟咏山水,《龙眠》《助山堂杂咏》诸诗不加藻饰,托旨冲淡,自有靖节风操;方大镇“三径谁同彭泽酒,一裘仍对蓟门霜”^⑤“幸逢于祐来题叶,不信陶潜悔折腰”^⑥“门同彭泽五株柳,身在元龙百尺楼”^⑦,则引渊明为同调。阮大铖政治节操污秽不堪,但《咏怀堂诗》诸作多山水田园,如《园居诗》《述怀》《田间即事》《饮酒诗四章》等,诗风则澹秀自适,得渊明真趣,马士英誉阮诗“以陶储王李为门庭,汉魏为堂奥,三百篇为归宿”^⑧;陈三立称其诗“具体储韦,追踪陶谢”“咏怀堂诗,五言古希踪陶韦,称最胜”。^⑨阮氏不仅诗风似渊明,还进一步辨析陶诗在诗学史上的意义,如《读陶公诗偶举大意示圣羽价人五一慧玉·有论》云:

靖节诗萧机玄尚,直欲举《大风》《柏梁》《短歌》《公宴》,汉魏间雄武之气一扫而空之。以登于《考槃》《北门》之什,似《离骚》《歌》《辨》亦在,然疑出入中也。至齐、梁、三唐,彼何知有此世代,而区区谓其简澹,有以相胜。此后人弗论世而管、蠡、柴桑者矣。乃易世而有辋川、太祝、京兆三子者,又能变化,以广其意。令从陶入《三百》,功力倍取资博,而意象更觉日新,则后起群贤不可不勉也。^⑩

阮大铖既肯定了渊明简澹的风格旨趣,也

从诗史经典秩序建构的层面探究了陶诗上溯《风》《骚》的源流,在审美及价值的双重坐标上予以历史还原,这种认知是比较深刻而理性的。

易代之际,诗坛充斥着遗民野老的悲愉感愤,作为精神上的支撑与民族情怀的寄托,陶渊明桃源避秦、隐逸不仕宋的道德操守与忠义行为,往往会引起桐邑士子的强烈共鸣。除了方文之外,尚有多人拟仿陶以遣性情。如钱澄之,有《仿渊明归鸟诗四章》《仿渊明饮酒诗十二首》等,韩荃、朱彝尊皆先后指出田间之诗不仅诗体深粹,度王孟而及于陶,有情景具真,庶近于渊明。又吴道新,甲申国变,被执不屈,逃归隐于白云岩之麓,与渔樵牧豎为伍,安贫乐道,不趋公府垂四十年;晚年自署函云杜,作《函云头陀传》《函云似陶说》以表忠义不屈之意。《龙眠风雅》续集卷四载其《白云南山歌》序云:

予有白云,有南山,雅与彭泽合,而元亮二语,南山与白云比隆也,予无一言纪之,不几山灵含愠乎?今拈元亮二语作堂联,而以“悠然见南山”五字勒衡门之额,庶不负南山,无愧于彭泽矣。歌以志之。^⑪

- ① 严迪昌:《清诗史》,第1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② 朱则杰:《方文〈四壬子图〉考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孙雨晨、罗时进:《〈四壬子图〉与清代诗人图像题咏现象》,《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 ③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第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 ④ [明]冯复京《说诗补遗》卷二,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五),第3875页,济南:齐鲁书社,2005。
- ⑤ [明]方大镇:《暮秋》, [清]陈济生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上),第2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 ⑥ [明]方大镇:《和姚前甫秋夜感怀之作用韵》, [清]陈济生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上),第2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 ⑦ [明]方大镇:《刘燕及招饮……故篇中兼属意焉》, [清]陈济生编:《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上),第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 ⑧⑨⑩ [明]阮大铖撰,胡金望、汪长林校点:《咏怀堂诗集》,第527、528、38-39页,合肥:黄山书社,2006。
- ⑪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七册,第3113页。

作为一种现象,“遗民”不仅是政治态度的表征,也是情感状态及价值立场的呈现。在故国与新朝的时空背景下,在历史与诗歌的双重语境中,“陶渊明”及其相关“五柳”“南山”“桃源”等意象,成了极具隐喻与象征的诗学符号,展现了遗民不仕新朝的生存方式和情感体验。从这个角度来看,钱澄之、吴道新等隐于渔樵、逃禅及拟陶之作无疑成为典型。尚需补充的是,清初国祚趋稳之后,桐邑簪绅朝士也有和陶之举,如张英《同孝仪和陶归园田居》、张茂稷《和陶田园诗》等,遗民意蕴已单薄寡味,多追求烟霞林光、清泉农圃,以此标榜其清逸的风致。

明季杜诗学兴盛有着鲜明的时代氛围与遗民诗学背景。时局动荡促使文人在杜甫忠义情怀、忧患意识以及批判精神中寄托乱世悲情。就桐邑诗坛而言,遗民诗群多有国破家亡之恨。困厄颠沛之时,讽吟杜诗,既纪潜行南甯以抒悲情,另则据此展示故国之思。如潘江曾言:“秦冠围桐,予夜缒妻孥,取间道趋枞阳而获免。陈子(陈式)亦甯身江干附予舟以南,一时感遇忧乱,辄于逢窻柅楼间扣舷诵杜诗,为之疏解其意,实获我心。”^①故有大量的和杜、拟杜、集杜及其吟咏评点之作,如赵钺《仿杜诗》、李雅《百忧集行用少陵韵》、方畿《和答李士雅拈少陵诗首句十首》、孙中础《岭南秋兴八首此老杜原韵》《游父执司马李梅公先生别业次老杜何氏园林韵》、方中通《和老杜诸将五首》等,另方尊尧著《杜诗集注》、姚孙森著《集杜诗》一卷,左国材著《杜诗解颐》,又邓铨著《南州集杜》《吴越集杜》《江楚集杜》《北山集杜》《栲岑集杜》等,以及《谒选》《次韵》《作吏》《闲居》《放吟》《浪游》《寓成》《归田》集。刘文钱序云:“小巖自唐山解组归,出其所撰集杜数十种,于杜诗千四百首中,左之右之,离之合之,若裁五色之云,成天孙之锦。”^②这可谓集杜诗至极致了。除了在创作上拟杜,方文《杜诗评点》与陈式《问斋杜意》也颇具特色。

方文曾评点杜诗,如康熙八年(1669),钱澄之困居皖上,盦山自白门前来辩难杜诗。“聊以解忧,因作此书。书甫成,而尔止病。未几返棹,遂死,此书也竟未见。”^③后钱陆灿批《杜工部集》曾转钞方文评点,另何焯《义门读书记》

辑录方批杜诗三十余条。方文批点杜诗,揭章法、析结构,明诗体、识音韵,又能辨异文,出新解,为世人所推崇,钱谦益与其探析《游何将军山林》章法结构,^④并称方文精于“铺陈杜老诗中史”^⑤。又陈式《问斋杜意》,是书有《漫述》四十条,主张“意法”释杜,以诗法解子美作诗之性情。在杜诗“诗题”的探究中,陈式从言意主情的角度阐述诗、题辩证的关系,站在诗史流变层面将其溯及《诗经》诗题并称的源头,又从缘情的维度主张诗先于题的创作实践,而对因题作诗及命题谋篇的维护与判断有着科场的文化背景及现实的考量。此外,《问斋杜意》援引同人的批注,人数达七十余人。其中张氏家族、何氏家族、左氏家族及李芥须等龙眠耆旧皆与问斋互动批杜。正是通过师承及姻亲关系,龙眠诸子相互汲引扬诤,形成一个区域批评网络,也展现出桐邑的诗学特色。

除了宗杜、批杜外,桐城诗人的诗学取向也呈现出重白居易的趋势。倪荫南《题山如集》云:“吾乡诗人何累累,凤跃龙翔不一体。近日流风宗乐天,往日沉郁追子美……香山浣花看后来,掷地金石满人耳。”^⑥又方文《潘蜀藻招同陈二如夜集有赠》云:“吾乡诗学自纷纭,古义深求在两君。注就杜陵真一绝(二如注杜诗甚精),吟成白傅浑无分(蜀藻学长庆体最肖)。”^⑦虽说都是师法乐天,但若细加考辨,在精神风貌及体格旨趣的契合上,尚有差别。其中方文学乐天,预设语境中遗民情结的批判精神更为浓

① [清]潘江:《问斋杜意序》, [清]陈式:《问斋杜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惺怀堂刻本。

② [清]徐璈辑录,杨怀志等点校:《桐旧集》第六册,第398页。

③ [清]钱澄之:《与方尔止论虞山说杜书》书后附识, [清]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田间文集》,第69页,合肥:黄山书社,2014。

④ [清]钱谦益:《与方尔止》,《牧斋有学集》(下),第13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⑤ [清]钱谦益:《方生行送方尔止还金陵》,《牧斋有学集》(中),第6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⑥ [清]潘江辑,彭君华主编:《龙眠风雅全编》第六册,第2417页。

⑦ [清]方文撰,胡金望、张则桐点校:《方盦山诗集》(上),第308-309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烈,如《捉船行》《忧旱》《谷贱》《纪灾》等以诗纪实,针砭时弊,在直陈时事的层面上与香山的讽谕态度一脉相承,也是“布衣语”对新乐府的承衍。就语体风格而言,方文好苦吟,“其有似乎香山者,必经累日构思,模拟刻画,久而后近之”^①。孙枝蔚题《龠山续集》诗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难。龠山诗合荆公语,轻薄儿曹莫浪弹。”^②可见,龠山学乐天的浅俗、平易,乃锻炼之后的纯熟之境。又潘江、祝祺、张杰、刘鸿都、孙中凤等皆喜白居易,后期曾举花会,踵九老耆英之举。其拟和乐天多即席唱和,援笔而成,得香山清娱唱和、闲淡怡情之趣。他们晚年的创作心追手摹乐天,语言真率自然,颇能得其形似,而才力薄弱,不免流入平易一派。此外,张英也推崇白居易,有大量的吟和之作。^③其《木厓集序》云:“香山务于尽而不伤其高淡者,韵有余也。子瞻、山谷皆力摹少陵而后不得入于香山者,才人握管,思以畅发其性情,类不乐为初唐诸子句镂字琢、比拟属对之工,而浩衍流畅,以务尽其才。”^④总体来看,张英崇尚白居易的高淡韵致,这与其顾瞻大臣的政治身份和尚雅鸣盛的审美内涵是互为表里的,而将白诗纳入“倡性情、唐宋并举”的诗论范畴,也体现了顺康之际唐宋调和的诗学理想。

结 语

从历史层面审视易代之际龙眠诗学传统演变的进程,不难发现,这种地域诗学共同体的形成,有着传统因素的持续性与影响力。李公麟的象征意义及明初诸贤的诗序规范与感召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桐邑诗学的秩序源流,也体现了诗学知识、记忆的历史传承。而若将龙眠诗学生态诉诸故国与新朝的时空语境及在场性的呈现,那么,在江南诗学版图的交融中,云、龙并峙的格局彰显着桐邑诗学的体派建构。而“尚实学、崇阅历”的地缘特点,有时代适变的契会及遗民文化的加持。以“泽园五子”为代表的桐邑诗人,经历了永社及金陵广集时期,诗风由大雅壮盛转向血泪歌吟,展现了鼎革时期风云激荡的心灵历程。但除了遗民性质的典型化创作,龙眠诗坛尚有大量的众层性写作。他们或隐圃逃

禅,不复履市,或交接时俗,清娱自适,既与遗民诗界有着紧密的地缘、血缘及学缘的人际关系,又因政治诉求、阶层属性的不同及社会关系的离合,在创作心态及文学经验的表述上呈多维化的选择。

而论之桐邑诗学谱系及师法取向的转变,必须承认,作为经典阐释与接受的能动性显现,易代之际桐邑“陶、杜、白”诗史秩序的建构,指涉的是时间与空间框架内诗学规范与个体性表述系统的双向互动。这一方面展现了诗学的内在逻辑与语言、结构等文学性的衍化传承;但另一方面,从接受主体的视野来看,更注重华夷之辩、布衣话语以及道德情操等时代性因素对经典的解构。所以,站在遗民文化立场上看,方文、钱澄之、吴道新及陈式等对陶、杜的形塑更侧重于隐逸人格、抗争品质的刻画与诉求。而阮大铖、晚年的潘江及张英等则有意淡化了这些背景因素,从讽谕走向自适,在诗酒文会、觥筹唱和中追求闲适自在的生命体验,在乐天知命的感悟中标榜着高雅而又折中的处世哲学。从这层意义上讲,龙眠诗学谱系的建构与传衍,不是传统诗学形态与价值系统的回归,而应视为龙眠诸子生命诗学中“期待视野”的具体化。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桐城派知识图谱系统及数字化平台建设研究”(AHSKZD2025D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童岳敏,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明清文学及文献学。

① [清]钱澄之:《潘蜀藻诗序》, [清]钱澄之撰,彭君华校点:《田间文集》,第 269 页,合肥:黄山书社,2014。

② [清]孙枝蔚:《溉堂前集》卷一,清康熙十六年(1677)刻本。

③ 章建文统计张英吟和之作多达 65 首。见章建文:《张英与清初桐城的崇白效白之风》,《社会科学论坛》2017 年第 4 期。

④ [清]张英撰,江小角、杨怀志点校:《张英全书》上册,第 304-305 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